

世界各国智库研究



YZLI 0890092085

李建军 崔树义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世界各国智库研究

李建军 崔树义 主编



YZLI 0890092085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版式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各国智库研究 / 李建军，崔树义主编.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01-009377-2

I. ①世… II. ①李… ②崔… III. ①咨询机构—研究—世界 IV. ①C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7363 号

世界各国智库研究

SHIJIE GEGUO ZHIKU YANJIU

李建军 崔树义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291 千字

ISBN 978-7-01-009377-2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言

智库，又称思想库、智囊团、脑库、点子制造厂，英文称做 Think Tank，是指由各学科专家组成，为决策者在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思想、理论、方法和策略等的咨询研究机构。在不同的国家，对智库内涵的界定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美国，智库仅仅是指独立于政府、政党之外的民间智库；而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比如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智库则大多都与政党、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智库获得了较大发展。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2009 年年初发布的《2008 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共有 5465 家智库，其中北美和西欧有 3080 家，占 56.35%；亚洲有 653 家，占 11.95%。从国别看，美国以 1777 家占据首位，其次是英国的 283 家和德国的 186 家，印度拥有 121 家智库，为亚洲最多，日本其次，为 105 家。

一、智库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智库已成为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各种类型的智库，如美国的兰德公司、胡佛研究院以及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日益增多和活跃，在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国家决策链条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有些学者甚至把智库称作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在我国，一

个有着明显中国特色的智库系统正在逐步形成。在 2006 年 11 月由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被列为“中国十大智库”。中国智库正在成为党和政府的“外脑”，在党和国家的决策中，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一，充当国家和政府部门的外脑，为国家和各级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重要的咨询参考。美国的政策出台大致都会经过如下的程序：智库—媒体—国会—政府—政策出台。在我国，智库主要通过以下四条途径为党政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和参考：一是通过承担党政部门委托的课题，给党政部门领导报内参、送材料，把自己的对策、建议等研究成果，直接呈送给党政领导人参阅，以期为党政部门所认可、接受和采纳；二是直接参与中央和地方省市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相关决议、规划和政策等的咨询、起草和修订，在许多大事的处理和政策出台前，给领导出主意、当参谋、想办法；三是有的智库专家被请去给重要决策部门领导讲课，通过当面授课，向党政领导提供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四是通过召开学术研讨会、研究成果发布会等，邀请党政部门领导、新闻媒体参加。目前，中国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载体，正在逐步成为国家决策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担当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增效器。让民众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内涵与精神，是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并取得最佳成效的关键。智库通过资讯、论坛、讲座、出版普及读物等方式，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内涵和精神进行诠释、宣讲和普及，提高其影响力和公信力，客观上有助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增强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社会效果。

第三，发挥启蒙与教育作用，担当人才蓄水池。很多智库都有自己的教学机构，承担培养人才的任务。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自己的教学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兰德公司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凭借自己雄厚的实力和影响力，成立了兰德研究学院，以学用结合的的独特方式，培

养公共政策分析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智库通过把相关的知识传播给公众，起到了教育和启蒙民众的功能。在美国，为政府储备和提供人才是智库的主要功能之一，智库的成员直接进入政府重要岗位，直接参与决策过程；另一方面，离职的政府高级官员有相当一部分进入各大智库，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高层，智库与政府之间频繁地交流人员，形成特有的“旋转门”现象。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舒尔茨（Charles Schudies）曾在约翰逊政府时期任预算局局长，在卡特政府时期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吸纳了许多从国防部与国务院卸任的高级官员为研究员，被外界称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储备场”。近些年来，在中国也开始出现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人员流动的现象。

第四，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汇集社会不同的声音，创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倾听民声、民主决策，是科学决策、建设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科学决策通常是多个视角、多个角度的意见碰撞的结果，思想和观点的多元化为决策优化提供了可能的空间。而思想和观点的多元化，恰好是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的本质特点。民间智库往往能够表达社会的声音，深入人心，体贴民情，实现政府和民众的较好对接，有利于科学决策，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五，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个国家的智库在组织机构、业务范围和研究课题等方面加快了国际化步伐，日益频繁地开展国际合作，重视全球性课题的研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从而开辟国际交流的新渠道、新平台，“智库外交”已经成为国家之间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近些年来，无论是外国领导人对中国的访问，还是我国决策层与海外的交流，智库的第二轨道作用日益明显。2008年12月，国务委员戴秉国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会见了美国智库人士，并在布鲁金斯学会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晚宴上发表演讲。200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访美期间，利用各种方式和机会广泛接触美国有重要影响的知名智库和相关机构，先后与布鲁金斯学会以及国会众议院“美中工作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进步中心、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美中贸易委员会等举行了多场会见会谈，就

中美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智库在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各国智库通过人员之间的交往、合作研究课题、举办国际性研讨会或者正式结成智库网络等方式，促进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与世界 55 家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二是扮演外交接触的“第二轨道”作用，如亚太安全问题论坛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就是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起，英美智库联手合作的产物。再如“东亚思想库网络”是由东亚国家领导人会议正式认可的推进“10+3”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一个“第二轨道”外交活动平台；三是在国家双边关系中发挥“助推器”作用，就某些涉及国家双方利益的重大问题一起进行探讨，并在探讨中加深理解，以求达到某些共识。如中国与欧盟首脑会谈商定建立“中欧思想库论坛”，并于 2004 年 12 月在海牙召开首次中欧思想库圆桌会议，从而推动双边加深了解与政策沟通。

智库的重要作用使其日益成为当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绕不开的重要研究对象。

二、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智库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日益重视智库在决策咨询、舆论引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从各个方面关心和支持智库建设。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就注意听取广大群众和专家的意见，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在 1990 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要重视和加强决策研究、决策咨询机构的工作，发挥它们的参谋作用”。这是我们党在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要重视和加强智库建设，注重发挥智库参谋作用的重要论断。

为了有力地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江泽民同志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一再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要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特别是在《领

导科学系列讲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江泽民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发挥智囊团作用的思想，指出现代决策者“要有智力上的延伸，没有智力的延伸，没有智囊团是不行的。需要组织一批智囊团，为领导决策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而且协助做出正确的选择”。充分肯定了智库的重要作用，并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中国智库发展进一步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了办好智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中国智库的大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定期集体学习，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到场讲授有关问题，同时逐渐建立起了国家大事要事听取智库专家意见的制度。

三、建设一流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已成为国家和地方社科院发展的重要目标

2004 年 1 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05 年 5 月 19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要“进一步办好社会科学院”。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各省市地方社会科学院，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一流新型智库，做党和国家离不开、信得过、用得上的智囊团和思想库的发展目标。

建设一流社会主义新型智库，是各级社科院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出的科学抉择。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迫切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体制、研究内容和研究形式，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新课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知识，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在新的

形势下，各级社科院必然要承担起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的职责，充分发挥参谋和助手的作用。

建设一流社会主义新型智库，是各级社科院的重要科研职责。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使命在于探索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发展社会科学自身。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一内在规定性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根本依据和逻辑起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智库是高度的理论自觉性和实践主动性的统一，是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要求和特点。因而，研究智库的内涵、特征、历程和发展趋势，总结世界各国智库发展的经验，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建设特点和规律，以及地方社科院更好地服务地方决策、服务社会发展的途径，就成了一个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并从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我国学术界也已有学者开始研究智库问题。本书希望通过对中外智库系统深入的研究，能够在智库的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为我国目前的智库建设，为各级社会科学院的转型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但是，由于对智库的研究起步较晚，深入、系统、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各种资料也十分缺乏、零散，收集起来非常困难，因此本书的目标实现了没有，实现了多少，只好交给读者去判断了。或许，我们的初步研究成果能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和启迪。

2010年7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现代国外智库概况	1
一、智库的起源与界定	1
二、智库的地位、特点与分类	5
三、智库的发展历程	14
四、世界智库发展现状	23
第二章 美国智库	31
一、美国智库的起源与发展	31
二、美国智库的运作机制	36
三、美国智库的对华研究	48
第三章 欧洲智库	57
一、欧洲智库的兴起	57
二、欧洲智库的现状	59
三、欧洲著名智库选介	69
四、欧美智库简要比较	75
五、结语	80
第四章 亚洲智库	83
一、日本智库	83

二、韩国智库	95
三、印度智库	98
第五章 中国智库	102
一、中国智库的历史沿革	102
二、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	106
三、中国主要智库介绍	109
四、中国智库发展的主要趋势	118
五、香港智库	120
六、台湾智库	122
第六章 中外智库比较研究	129
一、现代智库的起源及中西方智库的历史比较	130
二、中西方智库的类型比较	133
三、中西方智库的经济投入比较	136
四、中西方智库的治理结构比较	140
五、中西方智库的影响力比较	144
六、结语	148
第七章 国外智库建设及其启示	151
一、国外智库的运作机制	152
二、国外智库发展趋势	154
三、国外智库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159
第八章 地方社科院向新型智库的转型	167
一、“新型智库”的提出及其内涵和实践	167
二、向新型智库转型面临的障碍	172
三、如何建设新型智库	181
附录：世界各国（地区）主要智库名录	189
主要参考文献	279
后 记	284

第一章 现代国外智库概况

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2009 年第 1 期刊登的《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报告，目前全球共有 5465 个智库，其中北美为 1872 个，占 34.25%；西欧为 1208 个，占 22.10%；亚洲为 653 个，占 11.95%；东欧为 514 个，占 9.41%；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 538 个，占 9.84%；非洲为 424 个，占 7.76%；中东和北非地区为 218 个，占 3.99%。在当今世界智库架构中，欧美智库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又以美国最具代表性，在大部分公众甚至专家的眼中，美国智库俨然成为国外智库的代名词。美国现有智库 1777 个，世界排名前三位的最具创新力智库（卡托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对公共政策制定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传统基金会）都在美国。鉴于此，本章对国外智库的分析也将以美国为主。

一、智库的起源与界定

“智库”一词译自英文的 Think Tank，又称为“思想库”，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想法或智慧的集合。它于 20 世纪初诞生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崭露头角，20 世纪 70 年代后迅速增长，并在世界范围内扩散。据称，目前现存的智库有三分之二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建立起来的，其中，超过一半创建于 80 年代。

(一) 智库的起源

目前,学术界对到底哪一个机构能称得上是世界上第一家“智库”还有异议。从宽松的角度讲,智库的雏形自古就有,如古代西方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智者,中国为帝王将相所用的谋士等等。但是学界公认,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因为这些早期形态的智库与现代智库的基本特征相去甚远。从审慎的眼光来看,智库是近现代的产物,但关于现代智库的起源,则有多种不同的见解。以美国为例,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四种观点:^①(1) 19世纪初期说。美国著名智库研究专家保罗·迪克森(Paul Dickson)在其1970年出版的专著《智库》中认为,1832年美国财政部与费城弗兰克林研究所委托研究合同的签订,乃是现代智库诞生的标志。^②(2) 19世纪中后期说。美国学者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认为,1865年由美国社会科学促进会推动,在马萨诸塞州召开的关于经济、社会秩序重建的各界联席会议才是智库的起点,这次聚会使得知识界开始认识到知识共享所带来的好处。^③(3) 20世纪初说。持此说法的学者其观点又有所不同:如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认为,1900年成立的全国市民联盟是最早的智库;詹姆斯·迈克甘(James McGann)则认为,1916年成立的政府研究所才是现代智库的起源。(4) 20世纪40年代说。认为智库最初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军官进行作战计划讨论的研讨室,后来泛指以工业政策研究为中心,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政策研究机构。^④在英国,关于第一个智库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1831年由威灵顿公爵建立的防务和安全研究所(RUSI),1884年成立的以推进社会渐进式改革为目标的费边社,等等。目前,国外学界比较认同的说法是20世纪初说。

由上可见,关于智库的起源可谓众说纷纭。不过,到底谁是第一个现代

① 参见袁鹏、傅梦孜主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② Paul Dickson. *Think Tanks*. New York: Atheneum, 1970. P.9.

③ James A. Smith. *The Idea Broker: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P.24.

④ 参见王莉丽:《希望智库成中国软实力象征》, <http://cul.sohu.com/20100121/n269746624.shtml>.

“智库”并不是本书研究的焦点，也不构成本书研究的障碍。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总结国外智库的发展规律及发展趋势，以期对我国智库的建设发展有所裨益。

（二）智库的界定

关于智库的定义，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对智库定义的不同，不但导致了智库类别和特点的差异，更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智库形态、运作机制及其地位作用的五花八门。

根据美国传统词典和韦氏词典对智库的定义，智库是对社会政策、政治策略、经济或科技问题、工业或商业政策以及军事建议等进行研究或鼓吹的某个组织、机构、公司、团体或个人。中国学者薛澜、朱旭峰在尝试对智库进行释义时发现，西方学术界对智库的界定存在很大分歧。有的学者强调智库作为一种组织的社会职能，认为智库的首要目标是影响公共政策。如迪克逊（Dickson）认为：“思想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英国学者詹姆士（James）认为：“思想库是从事于力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多学科研究的独立组织。”有的学者则把智库定义为社会制度安排中的一部分，代表人物有凯莱（Kelley）等。还有的学者强调智库的机构运作特点，如迈克甘认为：“智库是指独立于政府、社会利益集团如公司、利益团体以及政党等力量的具有相对自治性的政策研究组织。”斯通认为，智库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并从事公共政策问题分析的非营利组织”。里奇（Rich）把智库定义为：“那些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取向的非营利组织，它们生产专业知识以及思想观念，并主要借此来获得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上述定义有这样几个共同点：一是强调智库的“独立性”，二是强调智库的“非营利性”，三是强调智库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四是强调智库以影响政策为目的。^①

国内学者也分别对智库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如王莉丽认为，智库是“指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组织，其目标客户是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大众，思

^① 参见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载《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6期。

想库力图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舆论”^①。薛澜、朱旭峰在对国外各种定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需要从智库的“本体——政策研究机构、目标——影响政策制定、地位——独立性、状态——稳定性”等四方面进行界定，才能将智库的内涵表述清楚。他们将中外智库的现实情况从以上四方面进行对照之后，将智库定义为一种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②《金融博览》在其2009年8月刊发的《发达国家的著名智库》一文中，就借鉴了这一定义，并进一步阐释说，智库是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③陈卓武等人认为，智库主要是指那些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影响政府公共政策选择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的研究机构。^④承婧认为，智库相对稳定并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是政策决策过程的重要参与者，是一种以政策研究为中心，以直接或者间接方式服务于社会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独立研究机构。^⑤刘波谈到，思想库这一术语用来指称那些政府之外的、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主张自由市场的机构，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为政府决策提供思想支持。^⑥张新霞认为，智库是以从事多学科研究为依托、以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为目的、以提供思想支持为基本方式的非营利性组织、团体和机构。^⑦

以上各种定义，有的简洁，有的全面，各有所取之处。我们基本认同王莉丽对智库的定义。这个定义明确指出了智库的研究对象、目标客户、研究

- ① 王莉丽：《美国思想库发展历程及面临挑战》，载《红旗文稿》2009年第14期。
- ② 参见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载《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6期。
- ③ 参见本刊编辑部：《发达国家的著名智库》，载《金融博览》2009年第15期。
- ④ 参见陈卓武、韩云金、林逢春：《试析美国思想库的运行机制——兼论其对中国发展思想库的启示》，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 ⑤ 参见承婧：《政府的外脑：美国思想库取得成功的制度性分析》，载《社科纵横》2007年第2期。
- ⑥ 参见刘波：《英国两大政党的决策机制分析——思想库、压力集团和政党领袖对社会政策的影响》，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 ⑦ 参见张新霞：《英国思想库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载《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目的和非营利性质,简单易记,更主要的是它结合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政策研究机构都属于体制内机构的实际,对西方智库所强调的“非政府性”和“独立性”做了弱化处理,这样就可以把包括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高校系统等在内的政策研究机构都纳入中国“智库”的范畴。如果像西方智库那样,把“非政府性”和“独立性”作为智库不可或缺的要素,则不仅目前中国可以称之为“智库”的政策研究机构寥寥可数,也不符合所谓“体制内”政策研究机构对政府决策过程发挥重要影响的实际。

二、智库的地位、特点与分类

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且各具特色,但总体看来,现代智库有其区别于政府机构、各类研究所和古代幕僚的明显特征,如运作的独立性,组织的稳定性等。智库通过其客观的研究、中立的态度和高质量的成果提升了权威性,成为智库博得社会各界认同的重要原因。在智库的地位不断提升、影响力不断增大的同时,智库的种类也愈益多样化。

(一) 智库的地位与作用

智库在现代政治与公共生活领域中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在影响政策的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通过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相关理论,便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朱旭峰介绍了西方学界可以分析智库的几种理论,如精英理论、多元理论、国家理论等。^①他在其分析框架中,选择了以精英理论为基本视角,以社会结构为分析范式,以网络与知识运用为政策过程理论起点,以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为补充。

下面我们比较一下精英理论与多元理论在分析智库地位上的解释力。首先,精英理论认为,社会中存在这样的利益集团,他们在智力、性格、能力、财产等方面要优于一般大众,他们掌握着重大决策权,根据其所处的领域,又可以被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等。依照精英理论来分

^① 参见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清华大学出版 2009 年版,第 10 页。

析，智库当属于知识精英集团，它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知识 and 话语权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精英集团展开对话与合作，以起到影响政治、社会发展的作用。其次，多元文化主义是近二十多年来活跃于美国学术界、教育界和政治界的一种政治和社会理论，在政治领域，多元主义的体现就是“多头政治”，或称多元民主。罗伯特·达尔的多元政治理论认为，多元民主是一种“现代代议制民主”，其中包括官员选举、表意自由、信息对称、社团自治等要素。在多元政治的理想状态下，各类利益集团都有机会参与到竞争之中。智库既作为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也作为表意群体参与到政策制定当中，其掌握的广博的知识和海量信息是它们参与现代政治的利器。就美国而言，虽然多元主义与美国当前的主流思想有所矛盾，将智库明确作为多元政治中的“一元”难获认可，但“多元化”潮流在美国政治界的影响确是不可小觑的。在二者的解释力上，笔者认为两者在伯仲之间，但是如果针对我国的情况而言，可能精英理论更为适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智库在现代政治中的地位，它在社会政策制定和社会政治运转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常，国家的管理者对社会问题或现象的基本面有着足够的了解和把握，但是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对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而与此同时，智库则有着专业的研究人员和团队，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开发，并把宣传、兜售自己的研究成果来影响政策制定作为目标。智库集中的专家都是各个领域内的精英，他们具备丰富的经验与渊博的学识，对某一领域内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往往具有高度的实践价值，为决策者、管理者提供多种方案与建议以供选择。更具体地说，智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思想。“智库”重点不是在于“库”，而是在于“智”，即它不是理论、观点的堆积，而是有益的思路、有效的方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积累。^①“智库”最基本的功能即出“点子”、造“主义”，也就是说，从事思想生产和决策咨询是其核心活动。这也是决策者和决策机构对其真正的需要所在。智库的思想生产，是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张，并且力图

^① 参见：《“中国模式”需要大智慧》，www.chinathinktank.cn.